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第五辑）

丛书主编 江波

哲学的颂歌

——柏拉图对话的现代解读

（上册）

李革新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哲学的颂歌

——柏拉图对话的现代解读
(上册)

李革新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柏拉图的主要对话进行了系统而完整的解读,试图揭示柏拉图对话的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在解读过程中,作者首先突出和强化了柏拉图对话中蕴含的理论性和体系性,确立了柏拉图的古典理性主义原则。其次参考和引用了儒释道等中国古代哲学的很多观点,以扩展和深化对柏拉图基本观点的理解,并且揭示柏拉图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一致性。再次,依据柏拉图古典理性主义对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如霍布斯、康德、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和批判,以求反思现代性的起源、矛盾和出路。通过这种解读,作者试图使我们重新理解哲学和政治的基本含义和关系,以及重新理解哲人、知识、语言、理性、爱欲等重要问题,并且对我们全面理解柏拉图古典哲学、近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有所帮助,最终对我们的人格成长和政治完善有真正的助益。

本书可供西方哲学、政治哲学的爱好者及研究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颂歌:柏拉图对话的现代解读:全2册/李革新
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5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江波主编.第5辑)

ISBN 978-7-5608-5734-3

I. ①哲… II. ①李… III. ①柏拉图(前427~前347)—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2305号

哲学的颂歌——柏拉图对话的现代解读(上册)

李革新 著

责任编辑 丁会欣 熊磊丽 责任校对 张德胜 封面设计 张微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29.25
字 数 517000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5734-3

定 价 88.00元(全2册)

绪 论

怀特海曾经说,整个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解。这反映了柏拉图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柏拉图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奠基石,西方哲学中的很多问题都来自柏拉图哲学。但是西方人对于柏拉图的研究和理解又有多少合乎柏拉图的原意呢?或者说,西方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歪曲了柏拉图的哲学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对于柏拉图哲学的研究史,这个问题似乎就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答案。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对于柏拉图的研究和接受已经存在两大传统。一个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传统,一个是东方的伊斯兰教—犹太教传统。这两个传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为我们重新认识柏拉图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一、柏拉图哲学的西方基督教传统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对柏拉图哲学的研究和理解主要有基督教的、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的三个方面。

第一是基督教的理解。基督教在古罗马帝国兴起,并且很快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来日耳曼蛮族虽然灭亡了古罗马帝国,却接受了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成为中世纪统一欧洲的唯一精神力量。在和希腊人、犹太人、摩尼教等宗教的论争中,基督教为了证明自己的教义的合理性,开始借用古希腊哲学为自己辩护。因此,中世纪哲学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以“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为目的而展开的。在“信仰寻求理解”的原则下,西方基督教接受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并且形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奥古斯丁主义主要是以柏拉图主义哲学来理解基督教信仰,在整个中世纪都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即使在16世纪天主教会把托马斯主义规定为天主教会的正统思想之后,奥古斯丁主义也仍然是新教神学家的重要理论来源。可以说,奥古斯丁确立了基督教对柏拉图主义的接受和理

解。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奥古斯丁主要是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而以柏罗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柏拉图对话是具有原则性差异的。新柏拉图主义主要是依据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思想,围绕着世界的起源与归宿的基本问题展开。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柏拉图对话的主要问题。柏拉图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和哲学的关系问题。根据新柏拉图主义理解柏拉图对话是远远不够的。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柏拉图学院的关闭,伟大的希腊哲学也越来越与西方人疏离了。柏拉图的著作大多遗失,几乎没有人真正读过柏拉图对话。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除了逻辑学,也几乎不为人所知。所以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对柏拉图哲学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另外,最重要的变化是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哲学不再是最高的、最神圣的,而成了宗教信仰的婢女。可以说,基督教信徒并不关心柏拉图对话的真实精神,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理解基督教信仰,如何在和犹太教、摩尼教等宗教的论争中进行辩护。这种对柏拉图哲学的宗教利用本身就已经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歪曲了。因为柏拉图写作对话时没有为某种宗教信仰辩护的意图,如果我们根据某种宗教信仰理解柏拉图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柏拉图。可以说,基督教神学的出现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把柏拉图对话中的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转变为哲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这种转变决定了后来整个西方文化的“西方性”,时至今日也仍然决定了现代人的基本问题和思维方式。

第二是现代性的理解,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在现代性的开端,西方近代哲人虽然重视古希腊科学和哲学,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推崇古希腊科学和哲学,而是试图超越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宗教,在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全新的更高综合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他们既试图战胜古希腊哲学,也试图战胜基督教哲学。这种进步观念或者抗争性决定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也导致他们对古希腊哲学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随着现代性的深入,现代性不断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机,特别是卢梭对现代性理性主义的批判,使现代性面临巨大的理性主义危机,现代哲人不得不寻求从古希腊古典哲学中重建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基础。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康德首先开始进行理性批判的工作。他认为要继

续推进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就应该认识理性本身。这种理性批判的最终结果就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以理论理性为现代科学奠基,通过《实践理性批判》以实践理性为现代道德奠基,而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这样康德就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奠基和辩护。但是康德哲学却陷入了所谓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困境。这导致后来德国哲人对他的批判。黑格尔试图以“绝对理性”来解决这种二元论分裂,他以辩证法的思辨方法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思辨理性主义体系。而且他还把历史问题带入哲学问题中,把历史看作是人类达到理性和自由王国的过程,从而最终确立了历史理性主义,这种历史理性主义成为现代性的最高成果,因此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哲学的终点和历史的终点。我们也把德国古典哲学看作是现代性哲学理论的最终完成。由此可见,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被称为古典哲学,意味着它是对古希腊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的继承、借鉴和发展。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同样没有真正理解古希腊哲学的兴趣和需要,同样是从现代科学和现代政治的需要出发,改造和使用古希腊哲学的。例如康德指出:“我在这里决不想涉足于文字上的考证,来确定这位崇高的哲学家在他的表达上所联结的意义。我只指出,不论是在通常的谈话中还是在文章中,通过对一个作者关于他的对象所表明的那些思想加以比较,甚至就能比他理解自己还要更好地理解他,这根本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因为他并不曾充分规定他的概念,因而有时谈话乃至思考都违背了自己的本意。”^①也就是说,康德认为自己在现代性的原则下可以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这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对古希腊哲学和柏拉图对话的基本态度。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政治需要压倒了哲学需要,哲学又成了现代科学和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婢女。哲学成了低于科学和政治的东西。所以他们不是在推崇和颂扬哲学,而是在利用和贬低哲学。在柏拉图对话中,哲学才是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政治和历史等其他一切都是俗事。在他看来,政治生活的最高目的应该指向哲学,而不是哲学反过来服务于世俗政治,以哲学为政治辩护。而且在柏拉图对话中,哲学和科学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是一回事,并未出现哲学和科学的分裂。现代以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分裂是理性主义在现代性中衰败的表现和结果。也就是说,现代性虽然推崇理性主义,但是现代性并未真正理解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含义。由此可见,近现代哲学也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图对待古希腊哲学和柏拉图对话,没有如实地理解柏拉图哲学的兴趣。

第三是后现代性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最初开始于德国浪漫主义,德国浪漫主义兴起于对现代性理性主义的反对和批判。他们否定现代性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主义不能真正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真相。所以他们试图超出现代性的理性主义视野,去发掘古希腊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以这种更加完整和真实的非理性主义理解世界和人生。但是正如德国古典哲学是根据现代性的目的利用了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一样,浪漫主义则出于反现代性的目的而利用了古希腊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他们虽然都自认为认同古希腊文化,把古希腊看作是自己的精神故乡,但都没有真正认识古希腊哲学和文化的兴趣和需要,都是片面地接受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中的某个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奠基者主要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尼采认为现代性理性主义压抑和损害了生命,是颓废的虚无主义的一种形式。他认为这种虚无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造成的,而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都是柏拉图主义的延续,所以反对形而上学就是反对柏拉图主义。在他看来,柏拉图不过是被苏格拉底败坏的希腊青年,因此尼采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苏格拉底。在《悲剧的诞生》中,他认为苏格拉底开启了某种全新的哲学生活方式。“苏格拉底是理论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相信万物的本性皆可穷究,认为知识和认识拥有包治百病的力量,而错误本身即是灾祸。深入事物的根本,辨别真知灼见与假象错误,在苏格拉底式的人看来,乃是人类最高尚的、甚至唯一的真正使命。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①从此以后,各种哲学思潮相继兴起,求知欲不断泛滥,普遍的知识之网逐渐笼罩全球。因此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是科学秘教的传播者,使现代人陷入科学乐观主义的幻想之中。

①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64-65页。

但是这种知识乐观主义服务于利己主义的目标,其结果就是子弑其父、友杀其友的普遍杀戮的“实践的悲观主义”。所以他彻底否定现代性理性主义,试图在酒神的悲剧精神和后来的超人理想中确立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尼采是出于反现代性的需要来理解和反对柏拉图的,他也没有如如实理解柏拉图的兴趣。海德格尔不过是沿着尼采的道路继续前进。他同样出于反现代性的意图而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现代性导致人类被连根拔起的无家可归状态,而现代性的根源就在于传统形而上学,“无家可归状态是从存在的天命中在形而上学的形态中产生,靠形而上学巩固起来,同时又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掩盖起来”。^①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或者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首先发生在柏拉图把存在看成是“理念”的思想中。理念就是存在者的形式或者外观,在认识存在者的理念或者本质的过程中,存在者的存在反而被忽略了,存在开始从其源始开端处脱落,这一脱落被他称为“无蔽境界之瓦解”。“自此以后把在阐释为理念就支配着全部西方思想贯穿其变异的历史直到今天。”^②所以他试图通过解释学的方式解构整个西方哲学史。同样,他也试图到前苏格拉底哲学中寻找精神归宿,通过对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等哲人的重新解释,开创所谓的后哲学—后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的新时代。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出于反现代性的目的而理解古希腊哲学和柏拉图哲学的。后现代主义同样没有如如实理解柏拉图哲学的兴趣。从柏拉图对话的基本观点看,后现代主义在哲学和诗歌的斗争中最终选择了诗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对哲学和政治都“一无所知”。虽然他们也关注哲学和政治,却并未认真地思考哲学和政治的本质。

综上所述,整个西方哲学史确实是对柏拉图的注解,但是这种注解却是基于对柏拉图对话的歪曲和利用。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以后的西方人都是在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图来理解古希腊和柏拉图哲学。他们都没有兴趣和意愿按照柏拉图的意图去理解柏拉图。这意味着哲学在他们的理解中都被贬低了,哲学始终作为一种工具被理解和利

①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编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②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0页。

用,哲学成为他们为宗教、政治或者科学进行辩护或者论证的手段,哲学的独立性、神圣性和崇高性几乎完全消失了。仅从这一点看,我们也可以说西方“哲人”并不是柏拉图的“嗣子”,而是柏拉图的“逆子”。可以说,整个西方哲学应该分为基督教以前的哲学和基督教以后的哲学,两种哲学传统形成了一种西方哲学中的“古今之争”。重新理解和认识这种古今之争,对于我们研究整个西方哲学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研究至今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二、柏拉图哲学的伊斯兰教—犹太教传统

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之外,还存在柏拉图哲学研究的“第二条道路”,即伊斯兰教—犹太教传统。这种传统的被发现主要归功于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认为在对柏拉图的研究传统中,还存在一种非西方基督教式的模式,即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其重要代表是犹太教哲人迈蒙尼德和伊斯兰教哲人阿尔法拉比。他们同样在所谓的“启示宗教”的压制下研究柏拉图哲学,但是他们对柏拉图的理解和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他们对于柏拉图的理解是政治的理解,而不是宗教的理解。因为他们并不是把伊斯兰教或者犹太教看作是“宗教”,而是律法。正如施特劳斯指出:“犹太人和穆斯林所理解的启示的特征是律法(Torah),而非信仰。相应地,伊斯兰和犹太哲学家在反思启示时首先关注的不是一个信条或者一套教义,而是一种社会秩序,如果这种秩序是无所不包的话,它就不仅规范行为,而且规范思想或者意见。如此理解的启示就把自身交由忠诚的哲学家来将之解释为完美的律法和政治秩序。”^①根据犹太教正统观点,犹太教的核心是律法或者托拉(Torah)。摩西律法体现了犹太人与上帝的独特关系,是犹太人成为上帝选民的独特身份的表现,犹太人由此严格区别于其他民族。迈蒙尼德指出:“作为我们的信仰的准则,《律法书》是唯一的。我们坚信除了我们的导师摩西的《律法

① 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9-10.

书》外,从来没有过,也绝不会再有其他什么神圣的律法书。”^①所以摩西律法构成了犹太教的核心,对摩西律法的共同信仰和遵守构成了犹太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这种律法主义的宗教观导致犹太教哲人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解和接受,即着眼于律法,而不是信仰。哲学理性主义被用来为律法的合理性进行论证,而不是为信仰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所以犹太教的理性主义可以称为律法主义的理性主义。相反,由于基督教更加看重内心的信仰,认为上帝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对上帝的内在信仰和爱的行为中,所以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具有内在化的、主观化的特征,可以称为信仰主义的理性主义。因此,是侧重于公共生活的律法还是侧重于个人内在的信仰,构成了犹太教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根本区别。这种对宗教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了哲学的地位在伊斯兰—犹太教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中的根本差异。在伊斯兰—犹太教世界中,律法高于哲学,哲学必须服务于政治律法,哲学的自由活动始终受到了政治—神学因素的制约,哲学的地位正如它在古希腊世界中一样是含混的、不确定的,必须在政治—宗教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所以犹太教哲人和伊斯兰教哲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宗教社会中的地位,自觉维护了神圣律法的崇高性和必要性,没有发生哲学对于宗教的公开反叛。而在基督教世界中,由于对内在理智和灵性生活的过分重视和对外在公共律法生活的过分轻视,由于哲学成功地为基督教进行了辩护,从而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而更加稳固,所以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或者说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被忽略了,由此导致托马斯·阿奎那必须在哲学的法庭上为宗教神学辩护,因此进一步导致现代性的哲学对基督教的公开反抗。为了建立民族国家,现代哲学把基督教驱逐出政治世界,把宗教信仰看作是纯粹私人的问题,试图建立一个完全世俗化、哲学化、理性化的政治世界。由此可见,基督教世界把哲学和宗教作为基本问题的思维方式,就已经为现代性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施特劳斯认为伊斯兰教—犹太教传统更加符合柏拉图对话的根本精神和真实意图。因为柏拉图从来都是根据政治生活来理解宗教的。宗教并不被看作是个人的信仰,而是公共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政治生活的

① 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核心是法律,所以为了提高法律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也为了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法律必须以神的名义订立。因此宗教、政治和法律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这就是柏拉图《法律篇》中反复说明的基本原则。所以对于柏拉图来说,没有独立于政治生活的宗教问题。宗教的核心并不是信仰或者启示,或者说,上帝的启示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内在的体验和召唤,而是律法。基督教把启示看作是上帝的、内在的召唤和信仰,这本身就已经背离了柏拉图对话的基本精神。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哲人则继承了柏拉图的这种基本观点,依据律法来理解上帝的启示。因此施特劳斯认为犹太教的哲学理性主义的理论根源就是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官方的犹太教是律法主义的,并因此是理性主义的。这种理性主义从外来的哲学理性主义中获得了最强有力的支持,其在柏拉图关于上帝的概念中找到了完美的表达,他把上帝看作是一个通过仰望不变的、无生命的理念创造出宇宙的工匠。”^①所以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哲人都把柏拉图的《法律篇》看作是杰出的“先知书”或者“启示书”,把柏拉图看作是最大的先知。哲学和律法,而不是哲学和信仰,构成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哲学理性主义的基本问题。虽然柏拉图似乎没有遭遇到“启示宗教”的问题,但是柏拉图已经正确思考了哲学与神学—政治的关系,正确地把启示和律法联系在一起了。这就为后代哲人理解哲学、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确立了最根本的方向和原则。可以说,柏拉图研究史中的伊斯兰教—犹太教传统为我们超出西方基督教传统,重新理解柏拉图对话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这样,对于柏拉图哲学的研究似乎有了两大系统,即西方基督教的系统和阿拉伯—犹太教的系统。^②

三、柏拉图哲学的中国化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设想柏拉图经学史中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柏拉图哲学的中国化”的可能性。随着西学东渐,我国对西方哲学和文

① Leo Strauss. 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17.

② 关于伊斯兰教传统中对柏拉图哲学的研究可以参看程志敏著《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

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正如当年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一样,我们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的认识、理解和研究也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20世纪初,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于是产生了“中体西用”之类的争论,在维护中国文化道统的前提下利用西方的科技甚至政治手段,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当然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实践,不论在“体”的方面还是在“用”的方面都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巨大影响。从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我们开始关注西方的哲学、文学和基督教等方面,例如尼采、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等研究热点。这些研究和关注似乎也是要解决中国现代性的“体”的问题。21世纪以来,我们开始进一步关注古希腊哲学,特别是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对柏拉图哲学的关注和研究不断提升。这个过程表明我们正在试图全面理解西方的政治、哲学、宗教和文化等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不能再只是简单地认同或者反对西方文化,而必须首先客观地研究和理解西方文化,然后再决定是接受还是反对。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认识应该从狂热地、盲目地、无批判地接受和膜拜的阶段走向清醒地、冷静地认识和反思的阶段,这才是对待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正确态度。

具体到柏拉图哲学方面,国内对于柏拉图哲学的理解主要还是受到了基督教传统、现代性传统、后现代性传统的影响。正如前文已经表明的,西方人对柏拉图哲学的认识和理解始终是受到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的引导,没有如实理解柏拉图哲学的兴趣。如果我们简单地跟随,就不可能真正认识柏拉图哲学。所以我们必须自己重新认识柏拉图。本书对柏拉图对话的解读有意识地加入了一些“中国元素”,试图利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来理解柏拉图对话。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柏拉图经学史上的“第三条道路”。当然中国哲学内部也充满了分歧和矛盾,例如主要有儒释道三家的分别。但是在笔者看来,和现代哲学的根本特质相比,这三家之间的差异仍然可以说是自家内部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古今之争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看到强调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希腊古典哲学的相同性和一致性,以便更好地认识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和困难,找到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合理方法。因此我们不应该扩大或者夸大中国古典哲学和希腊古典哲学的差异性,坚持“求同存异”,两者之间

的相同性是主要的,差异性是要的。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复兴古典哲学意义上的哲学生活,而不是为了解决某种政治或者历史问题,包括现代性问题。因为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对中国哲学所知有限,这个解读工作还非常粗糙,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其主要目的还是抛砖引玉,以期来者。

柏拉图哲学中国化的“第三条道路”的正当性首先在于对古希腊哲学和文化的认识。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基督教以来的西方哲学是非常不同的。第一,从源流看,古希腊文化实际上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古希腊人包括柏拉图在思维方式上更接近东方人。中古阿拉伯哲人阿尔法拉比曾经概述了这种流传过程。“据说这种科学远古的时候存在于迦勒底人(Chaldean)那里,他们是伊拉克人(al-Iraq)。后来这种科学流传到了埃及人那里,从那里传给了希腊人,在希腊人那里一直保持到后来再传给叙利亚人,然后传给阿拉伯人。这种科学中的每一件东西靠希腊语而流传,后来是靠叙利亚语,最后是阿拉伯语。”^①所以古希腊文明可以说是东方文明的一部分,根据东方思想理解柏拉图也就更加准确和恰当一些。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古希腊哲学和文化属于古代东方传统,就认为东方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古希腊哲学和文化。正如不能认为柏拉图是西方人,西方人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柏拉图一样。在追求哲学智慧的道路上,我们最终必须消除所谓的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性,才能达到智慧的最高峰。如果哲学的探究受制于政治历史文化的局限,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第二,从哲学基本问题看,基督教以来的西方哲学是以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为基本问题的,而古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种基本问题的差异决定了古今哲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西方哲人看来,宗教和哲学的关系是最根本的问题。不论是中世纪基督教还是现代性、后现代性都受到了这个基本问题的支配和影响。宗教和哲学的关系之所以成为现代哲学的根本问题,一方面,从哲学问题的内部看,在中世纪世界中,基督教信仰彻底压倒了哲学理性,哲学理性成了为信仰服务的奴隶,导致哲学生活的窒息。这种压迫导致了文艺复兴以后哲学对信仰的

① 程志敏:《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反抗。启蒙运动试图完全以哲学和科学的理性彻底压倒信仰,否定信仰,确立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启蒙主义对理性的推崇本身就是信仰主义的,是非理性的,导致了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对。可见基督教以来的欧洲文明都是围绕理性和信仰的关系展开的。另一方面,从现实政治角度看,哲学和宗教之所以成为主要问题,还在于受到了西方独特的政治历史问题的影响。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欧洲唯一的、统一性的精神力量,罗马天主教会是整个欧洲的唯一统治者。天主教既是神圣的,也是世俗的。随着世俗国家力量的不断成长壮大,世俗国家开始试图摆脱罗马天主教会控制,试图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于是,基督教,或者准确地说,罗马天主教会成为各国独立运动中最主要的敌人。对罗马天主教会反对也必然进一步延伸到对基督教教义的反对。所以现代西方哲人才提出了政教分离的主张,主要目的就是把基督教驱逐出现代民族国家,使现代民族国家得以顺利建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随术变”,现代哲人并未保持对政治生活的独立性和超越性,而是试图成为自己国家的代言人和立法者,哲学开始为政治服务。也就是说,在宗教、政治和哲学的三角关系中,哲学和政治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宗教。所以在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成为最根本的问题,宗教而不是政治成为哲学最主要的对立面。

但是在古希腊世界中,没有独立于城邦的教会组织,没有独立的神职人员,也不存在超政治的宗教问题。政治城邦和宗教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因此古希腊哲人从未把哲学和宗教看作是主要矛盾。相反,哲学和政治城邦的矛盾才是主要问题。我们知道,哲学是对自然的研究,以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智者学派曾经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推崇一种反文明的自然法则,认为只有在非政治的自然生活中,人才能获得最真实的生活。但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这种把自然和政治文明对立起来的观念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自然并不是政治文明之外的东西,政治文明本身就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柏拉图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生活就是合乎人性的自然生活。对政治的认识就是对自然的认识。只有通过对政治文明的认识,我们才能最终认识自然整体本身。这就是政治哲学的产生及其意义。哲人对政治文明的考察使得他认识到一切现实政治制度都是不完

美的、不正义的。于是他就对政治生活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产生了怀疑。如果这种怀疑在城邦中的年轻人中扩展开来,就会对城邦的统一、团结和秩序产生危害。政治人民就会起来反对和迫害哲人。苏格拉底之死被看作是哲学和政治的矛盾关系的最大象征。所以哲人认识到哲学生活可能对政治生活产生危害,由此导致政治对哲学的迫害。同时,哲人也认识到政治生活是哲学生活的基础和根本,如果破坏了政治生活,哲学生活也必将受到牵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哲人必须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尽可能维护现实政治,在最大程度上协调和化解这个冲突。于是,解决哲学和政治的冲突矛盾,也就成为哲人关注的首要问题。柏拉图的整个对话都是在展示并且试图解决这个矛盾。

因此,古希腊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是非常不同的。由于现代西方文化是由哲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决定的,现代西方人对柏拉图哲学的理解就会受到这个基本问题的限制,就可能存在严重的偏差和误解。虽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现代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仍然可以从严格科学哲学自身的基本原则来说明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错误。换言之,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特殊性导致现代西方哲学在寻求建立“严格哲学”的道路上是不严格和不彻底的。也就是说,虽然西方哲学享有“哲学”之名,但至今都没有成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这是我们批判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哲人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自觉地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导致现代西方哲学成了政治意识形态。这可以说是对哲学的最大利用和扭曲。我们可以推测,一旦他们向往的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他们面临的政治和宗教的问题获得了解决,那么他们关注的基本问题即哲学和宗教的冲突问题也就消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政治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理论也就会退出历史舞台了。这就是所谓的“后哲学时代”。当然,在所谓的“后哲学时代”,哲学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应该重新理解自己,把自己从政治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而这个工作如果借助于柏拉图对话,就能够更好地完成。回到柏拉图对话,对于我们理解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生活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柏拉图对话对于当代哲学的重要意义。换言之,近现代西方的哲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并不是

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欧洲特殊的政治历史问题。而柏拉图关注的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才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不会随着政治历史的变迁而改变。因为柏拉图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基于人性的自然差异性,这种自然差异性是不会随着文明历史而改变的。也就是说,对政治中的人性的自然差异性的认识才是彻底的、无前提的哲学研究,哲学只有在对政治和人性的研究中才能成为哲学,哲学只有直面政治生活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相反,如果哲学把宗教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把神学问题作为主要问题,这种哲学本身就已经非常神学化了,大大偏离了古典哲学的问题意识。同样,如果哲人以设计和实现某种政治制度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忘记了超政治的哲学生活的根本意义,这种哲学就堕落为政治意识形态。如果哲学受到了政治或者宗教问题的制约和束缚,哲学就不再是对自然的认识和研究,就不再是彻底的、无前提的绝对之学。或者说,如果一种哲学思考受到特定的宗教教义的制约,受到某种特定的政治观念的束缚,这种哲学研究的整个视野和思维都会发生偏差,哲学生活的超政治本质和意义就被遗忘和抛弃了。鉴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问题和政治历史的独特性,可以说,现代西方文化确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这也就意味着现代西方文化似乎根本就不具有“普世性”。但是在当前,现代西方文化却已经成了一种“普世性”的文明,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世界历史命运的捉弄。因此面对整个西方哲学,我们必须重提“古今之争”的根本问题,“正本清源”,在柏拉图的严格哲学的意义上反思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化。

与古希腊哲学相似,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几乎不是问题。中国哲人几乎没有认真严肃地对待过宗教问题,既没有对某种宗教教义的批判,也没有把宗教作为自己的敌人。即使是朱熹的排佛也只是出于现实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出于哲学原因。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没有独立的神职人员,也没有独立于国家主权之外的教会。在古代中国,皇帝本人往往同时就是最高的教主。也就是说,王权和教权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和谐,实现了国家的本质同一性。因为任何正常的国家都应该是政教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不存在基督教世界中的

教权和王权的紧张关系,不存在消除教权、维护王权的政治历史问题。因此,中国哲人也没有面临建立民族国家问题,没有需要反对的、超国家的宗教教会的问题,正如在古希腊也没有超城邦的教会一样。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更多“家族相似性”。因此,中国古代哲人最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即如何完善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古典哲人把自我的完善和国家的完善统一起来,而自我的完善是国家得到完善的根本方法。这种对国家的完善并不是像现代西方哲人一样,根据一种抽象的政治理论和观念去推翻现实国家,建立一种新型体制的国家,而是站在哲学一天道的层面,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因势利导的方式、通过精忠报国的方式来完善国家。可以说,哲学和政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哲人首先关注的问题。从中国哲学传统内部看,儒家和道家、佛教的区分就类似于政治和哲学的划分。从大体上说,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儒家是强调入世的,道家是强调出世的。儒家的入世就是强调直接参与政治生活,报效国家,完善政治生活,承担起对国家的政治责任。道家的出世就是过一种超出政治生活的合乎自然的哲学生活。庄子的至人、真人、神人都是世外高人,他们蔑视人间事务,过着一种出世的自由逍遥的生活。儒家和道家、佛教虽然表面上是对立的,但是其实是对立统一、一脉相承的。因为道家、佛教的出世理想的存在,可以使人们从更高层次看待政治生活,因此得以提高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儒家对政治生活的维护是道家的出世理想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生活的稳定,一切崇高的理想都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哲学和政治的划分同时也表明了哲学和政治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关系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他们也有强烈的入世之志。苏格拉底一生没有离开过雅典,希望通过和人们的交往而改善他们,使雅典获得复兴。柏拉图则对雅典失望后试图在叙拉古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后在雅典城外建立学院教书育人。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是出世的。苏格拉底拒绝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一生远离实际的政治活动。柏拉图也强调在一切现实政治社会中,哲人并不有必须承担统治国家的责任。哲人对永恒的理念世界的关注和认识就是哲人的出世性质的一种表现。其次,中国文化中对哲学和政治的根本划